

东亚语言与文化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聂友军 陈小法 编著
刘 阳 张雨雪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YJG2018306)

东亚语言与文化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聂友军 陈小法 编著
刘 阳 张雨雪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语言与文化 / 聂友军等编著. — 杭州 : 浙江
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78-2879-2

I. ①东… II. ①聂… III. ①文化语言学—对比语言
学—中国、日本、韩国—研究生—教材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7653号

东亚语言与文化

聂友军 陈小法 刘 阳 张雨雪 编著

责任编辑 姚 媛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51千

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879-2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序 章 / 1

- 一、文化具多面性，他者做参照系 / 1
- 二、还原历史语境，发掘片段思想 / 3
- 三、博学深思明辨，舍疵取醇笃行 / 5

中 国 编

第一章 中国语言 / 8

-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认知 / 8
- 第二节 语言与社会交际 / 11
- 第三节 中国语言学简史 / 13
- 第四节 汉语音韵学发展 / 14
- 第五节 汉语的方言分化 / 15
- 第六节 翻译与文化适应 / 16

第二章 中国文字 / 20

- 第一节 汉字的形成与发展 / 20
- 第二节 汉字构造方法例解 / 22
- 第三节 汉字音形义与训诂 / 26
- 第四节 汉字文化圈与笔谈 / 28

第三章 中国文学 / 31

- 第一节 一代有一代文学之所胜 / 31
- 第二节 文学与地域：文分南北 / 37
- 第三节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举例 / 40
- 第四节 明清古典小说名著提要 / 43
- 第五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瞥 / 47

第四章 中国艺术 / 50

第一节 中国音乐艺术概观 / 50

第二节 中国绘画艺术略说 / 54

第三节 中国书法艺术简史 / 57

第四节 中国建筑艺术举例 / 61

第五章 中国历史 / 65

第一节 中国简史巡礼兼及史籍 / 65

第二节 古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 / 68

第三节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往来 / 71

第四节 古代东亚的征伐与侵扰 / 74

第五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的抗争 / 77

第六章 中国文化 / 80

第一节 中国物质文化举例 / 80

第二节 儒家思想演变轨迹 / 82

第三节 中国的哲学与宗教 / 85

第四节 中国的科学与技术 / 88

第五节 中国的职官与科举 / 90

第六节 文化的融合与对话 / 92

日本编

第七章 日本语言与文字 / 96

第一节 汉字 / 96

第二节 假名 / 106

第三节 罗马字及其他文字 / 112

第四节 日语语体 / 114

第八章 日本文学 / 117

第一节 神话传说 / 117

第二节 说话文学 / 119

第三节 汉文学 / 120

第四节 和歌 / 124

第五节 物语文学 / 125

第六节 女性文学 / 129

第九章 日本历史 / 131

- 第一节 日本人起源 / 131
- 第二节 绳文时代（约8500年前—2500年前） / 132
- 第三节 弥生时代（前3世纪—3世纪） / 133
- 第四节 古坟时代（4—6世纪） / 135
- 第五节 飞鸟时代（593—710） / 136
- 第六节 奈良时代（710—784） / 137
- 第七节 平安时代（784—1192） / 140
- 第八节 镰仓时代（1192—1333） / 148
- 第九节 南北朝时代（1333—1392） / 149
- 第十节 室町时代（1392—1467） / 151
- 第十一节 战国桃山时代（1467—1603） / 153
- 第十二节 江户时代（1603—1868） / 159

第十章 日本文化艺术 / 171

- 第一节 岩宿时代 / 172
- 第二节 绳文时代 / 172
- 第三节 弥生时代 / 173
- 第四节 古坟时代 / 174
- 第五节 飞鸟时代 / 177
- 第六节 奈良时代 / 178
- 第七节 平安时代 / 180
- 第八节 镰仓时代 / 182
- 第九节 室町时代 / 182
- 第十节 江户时代 / 198

朝鲜半岛编

第十一章 朝鲜半岛的历史 / 208

- 第一节 朝鲜民族的起源 / 208
- 第二节 古代朝鲜半岛上的早期国家 / 209
- 第三节 三国至统一新罗时期 / 213
- 第四节 高丽王朝时期 / 220
- 第五节 朝鲜王朝时期 / 225

第六节	近代以后的历史概述 / 229
第十二章	朝鲜半岛的语言与文字 / 231
第一节	汉字与汉字词 / 231
第二节	吏读 / 234
第三节	训民正音 / 235
第四节	外来词 / 239
第十三章	朝鲜半岛的文学 / 241
第一节	诗歌文学 / 241
第二节	叙事文学 / 254
第三节	使行文学 / 257
第十四章	朝鲜半岛的文化与艺术 / 258
第一节	服饰文化 / 258
第二节	饮食文化 / 259
第三节	居住文化 / 262
第四节	礼仪文化 / 263
第五节	绘画与书法 / 264
第六节	音乐与舞蹈 / 266
参考文献 / 268	
后 记 / 273	

序 章

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文化都是层层累积起来的，并且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有变迁，试图以简短的篇幅予以清晰界定或明确描述实非易事。事实上，探讨任何国家与民族的文化都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由文化样态的多面性决定的。要有效地勾勒东亚文化的轮廓，同时凸显其区别于其他文化的标志性特征，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几个侧面，此外还需兼顾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

一、文化具多面性，他者做参照系

中国幅员辽阔，广阔的战略纵深不仅使“以空间换时间”在战时成为有效的策略，在文化发展方面亦体现为不疾不徐、圆融浑成的特征。中国文化天然地存在历史性、区域性的条块区隔，“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又使得各地域间贸易交通与战乱征伐交替出现，造就华夏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文化在融合生长的过程中凝聚出强大的向心力。中国文化在日趋繁荣的同时，也以广阔的胸襟与充足的自信积极吸纳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相对早熟的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惰性。泛泛而论东西方文化特征的题目，早给侃侃而谈者弄得烂污了，除却“拉郎配”式比附与以偏概全的偏颇，比较的视野与方法却实实在在是可取的。兵书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对中国文化形成全面、客观、准确的认识，确有必要跳出“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取开放性和主体性兼备的综合思维，通过与他者并置比较，即异求同、因同见异，在了解对方的同时深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继而在此基础上追求取异质文化的精义补足自身。

说到日本文化，许多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日本无非古代模仿中国，近代模仿西方，自身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文化。诚然，日本文化的确善于吸收外来影响，但并不能因此

否认它本身的创造性与甄别取舍的自主性。日本在自身历史发展及与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已形成并发展出独特的、足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日本传统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经历了一系列的接触、碰撞、融合的过程。在日本文化发展史上,从弥生文化的异军突起,到大化革新、明治维新直至战后改革,面对形形色色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那种选择与调整的主动性与自觉性表现得特别突出。

外部世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发展出的文化成果并时性传入时,接受者可以吸收别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并以跨越式发展的方式追赶先进文化;但该过程是一把双刃剑,在省时省力的同时,若缺乏一个能够自我审视的时空距离,势必会造成难以接续的文化断层,外来的文化资源与本国传统若不能有机地整合亦可能出现问題,易引起强烈的文化冲突,或堕入畸轻畸重的境地,甚至会逆转迎头追赶先进文化的初衷。

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是拼盘式的,进一步加剧了日本文化样态原本就有的多面性特征。比如在军事方面,日本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编制;司法方面,日本1882年订立法国式的刑法,1898年订立法国、德国混合式的民法,1899年订立法国式的商法,又参考英美法系引入判例法;学制方面,放弃江户幕府面向贵族、旨在培养武士、以儒学为内容的教育方针,新确立的《学制》主要模仿法国,《教育令》主要模仿美国,《学校令》主要模仿德国。日本近代由“民主开化”经“国家主义”到“军国主义”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蜕变,早在急功近利、贪求速度的维新变革之初即播下了远因的种子。^①

相对而言,欧洲文化中“规定性”(prescriptive)的成分较多,而传统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中“描述性”(descriptive)的比重较大,这一点在东西方的法律法规、行政架构、宗教信仰,乃至个人的言行举止中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分。举例来说,在西方从基督教的《圣经》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无不倚重契约的“规定性”;而在中国,从儒家的“三纲领八条目”,到身为最高统治者代表的宋真宗赵恒所作《励学篇》,都以“描述性”呈现某种光辉前景以达到劝诱的目的。近代以来,传统东亚社会以文化向心力和经济吸引力的统合为基础的朝贡册封体系遭废弃,并被伴随着欧美列强殖民扩张而至的条约体系所取代,东西方文化间原有的本质区别日渐淡化,东亚内部的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与朝鲜半岛文化之间的分野转而趋于显著。

^①日本面临外来文化影响时,其自主选择的功能发挥往往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有客观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主观方面的局限。有关该问题更详细的探讨,参见聂友军:《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210页。

二、还原历史语境，发掘片段思想

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与文化都处于动态发展中，对其发展变迁历程的回溯无论多么详尽，都难以避免静态化处理之嫌，或者有意无意间形成大的跳跃。看似简单的事物往往具有多面性与复杂性，并且事无巨细都与其周边的相关问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作为原因、背景、动机、助推甚至反作用力，参与影响其他事物发展的方向、规模与力度。

历史发展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共谋的结果，是以不同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往往显示出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应当正确看待并适度强调文化的区别性标志，因为任何事物如果强调得过头则势必走向反面。我们致力于呈现事实的主要方面，但一种视角的选择无疑意味着另一种或更多种视角的放弃，在可能产生洞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与视域盲点。

分析文化问题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进行。黄仁宇提倡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视野着手看待具体问题，颇具启发性。探求一个词语的准确含义需要联系该词所处的上下文才能形成较全面的理解，同理，对文化问题的把握也只有结合其出现的时间、场合才有可能予其恰如其分的定位。对相关文化问题进行分析时，应在时间发展的方向上厘清其来龙去脉，并抓住主流；在空间铺展的维度上探求其前因后果，并把握关键；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贯通考察，庶可接近事实真相。

朝鲜王朝时期著名女书画家、文学家、诗人申师任堂（신사임당，1504—1551）的诗文创作皆用汉文完成，适成对照的是，日本“平安双璧”、位列中古三十六歌仙的紫式部（约973—1025）与清少纳言（约966—约1025）的主要创作皆用和语完成，而且紫式部还在日记中嘲讽清少纳言装作很有学问的样子，到处乱写汉字。究其根本，平安时代的日本普遍将汉学视为高深的“治世之学”，在紫式部看来，包括她自己在内，那种女流之辈吟风弄月的玩意儿，当然不适合用汉文表达。紫式部、清少纳言少用甚至不用汉文，既是出于对汉文汉学的尊崇，又是出于“妇德”的要求而自律。申师任堂自取“师任”为堂号，意在以周文王母亲太任为师。她以汉文汉诗表达自己立意做“君子”、寻求圣贤之道的信念，不仅无伤她对汉文汉学的敬重，而且还以其高尚的情操与高超的诗文书画造诣而被后人视作“妇德”的代表人物。

人文学研究不应责备求全，不要试图寻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式理论，或者硬性归结为带有普遍规律性的所谓发展模式。如今人们对理论有近乎宗教式的虔诚，对体系的构建执着到狂热的程度，事实上迷信体系的做法本不足取。钱锺书指出，在思想史上，“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

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①。我们提倡对“理论系统”的构建持谨慎的保留态度，而倾向于充分肯定“片断思想”的学术价值。

《汉书·徐乐传》中载有徐乐的“上皇帝书”，其中心论点是：“今天下大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今中外的历史，差不多都是在为徐乐两千年前做出的这一伟大论断做注脚。的确，就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而言，像秦末那样百姓揭竿而起（土崩）要比吴、楚、齐、赵等诸侯坐大挑战中央政权（瓦解）危险得多。好事者若在此基础上试图营造一个体系完备、封闭自足的理论体系，为使其普遍适用而不得不追加一些瞻前顾后的条件，推导出模棱两可的结论，则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一定的适用范围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强行套用，只能削足适履；研究对象千差万别，不加区分地硬性纳入一个封闭自足甚至是外来的所谓“体系”，最终将导致买椟还珠。

人文学研究还应力避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要适当引入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读唐史不难发现，唐代的安史之乱在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丝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此前越州等地虽为蚕丝产地，但丝织工艺并不高超，迨及安史之乱爆发，原本为宫廷供应丝织品的地区一度被叛军占据，后来长期脱离中央政府的实际统治，朝廷不得已才令江南地区进贡，当地工艺遂大为精进。但并不能据此就认为安史之乱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不是说类似的定量分析不能做，而是面对类似于战乱等大是大非的问题时，首先需要进行定性分析，旗帜鲜明地表达反对姿态与批判立场，而不应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偏颇观点所蒙蔽。中国古代批评家论诗，有“大判断”与“小结果”的区别，其“大”与“小”不妨移来类比处理这类问题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各自应占的比重。

中国历史上曾两次出兵，帮助与我们山水相连的朝鲜对抗入侵外敌，一次是明代万历朝出兵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入侵（壬辰倭乱），另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万历朝出兵尽管主要是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出于维护朝贡册封体系的意图，但因在朝鲜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之时施以援手，出兵援朝遂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抗美援朝虽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分野的驱动，但其正义性不言而喻，尽管朝鲜与韩国的分裂是“二战”结束时美国与苏联为瓜分利益与划定势力范围一手造成的，但在国际舆论中，中国因抗美援朝而被迫为美苏长期背书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比较分析中国历史上两次出兵援朝问题上，在做出基本相同的定性判断后，还要依托历史语境合理地进行定量分析，俾使识见更谨严缜密、研判更全面准确。

^①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三、博学深思明辨，舍疵取醇笃行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研讨东亚语言文化时应当具备心怀天下，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大视野、大格局、大情怀。前几年在“国学热”大潮裹挟下，传统文化几乎与“心灵鸡汤”成为同义语。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国家战略，我们有必要盘点一下要走出去或送出去的文化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在信息时代，应该摒弃那种将“传统”与“当下”、“外来”与“本土”对峙起来的狭隘思想，这种对立其实是冷战思维的残余，而是要从理论视角到研究方法都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并做到合理扬弃。研读东亚语言文化，我们提倡阅读经典与回归文本，在尊重文本原意的前提下加入时代精神，在批判与自省中探求真知、感受历史、体悟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比获取知识本身更重要。今人喜谈方法，随着学科细化，如今已没有条件催生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具备百科全书式知识结构的学者。同时又有太多的人倾向于定于一尊，或在潜意识中渴望有一种普适的方法，可以一劳永逸地作为固定模式随时随地套用。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所谓方法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学术观念问题，又是一个学术知识问题，也是一个研究者的学风问题”^①。我们无意也无力创设一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而只能随变化了的形势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关于如何读书与做学问，前辈学者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中响亮地提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②他也在众多学术著述中将东西方文化及学术知识汇通得水乳交融，谓之“打通”。“打通”要求研究者既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又有恢宏的视野，还要有一种纯正的比较理念。金克木先生以丰厚的人生阅历为底蕴，取与作者对话的读书方法，深入思考，关注当下，读书得间，始可达致“书读完了”的境界。日本五山禅僧虎关师炼在《济北集》中指出：“舍疵取醇何废之有？夫道出文字言说者，不容尽取也。先醇吾心而择其文疵耳。”^③不只体现出对“道”的孜孜以求，而且反映出一个日本人阅读中国典籍的心得，他在审视中国历史、文学、思想与文化时始终秉持“舍疵取醇”的理论自觉。

学者和有意以学术为志业的青年学生要勇于担当。陈寅恪先生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其著作广泛涉及文学鉴赏、文学史梳理、历史现象分析、史实考辨、思想史脉络分析，

①严绍璦：《双边文化关系研究与“原典性的实证”的方法论问题》，《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第5—6页。

②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③〔日〕虎关师炼：『济北集』，上村観光編『五山文學全集』第一卷，思文閣1973年，第298頁。

体现出对难以逾越的学科边界的“跨越”，更重要的是他所倡扬并身体力行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①给知识人的指引与启示价值。针对钓鱼岛、南海海域与岛礁主权问题，中国政府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且一度行之有效。如今情况变化了，部分学者仍拘泥不肯变通，实不足取。试问，搁置争议是否成为争端相关方的共识？如果不是，对方会不会理解为我方有让渡主权声索的退让之意？我们单方面承诺韬光养晦就一定才能保证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吗？学者本应靠自己的思辨得出结论，而不应主动推卸研究的责任。学者的研究成果理应有前瞻性，方能对政府决策起到参考作用，而不是满足于“听将令”而固步自封、亦步亦趋、随声附和。

研究东亚历史文化和研究一切其他学问同理，都不应一味地钻故纸堆或闭门造车，而要有心怀天下的使命担当。朝鲜半岛是东北亚的地理中心，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价值。后冷战时期，围绕半岛问题，相关各方最大的困境在于缺乏政治互信，进而导致过度的国家安全焦虑，为缓解焦虑，各国不约而同地扩充军备或加强显示军事存在，这反过来进一步打击了原本就很脆弱的政治互信，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使得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且有日趋难解的势头。半岛地区的局势一度剑拔弩张，牵动诸大国乃至全世界的神经。妥善处理以朝核问题为焦点的半岛难题，既应该以史为鉴，又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更加多元、立体、全面地认识半岛以及相关各方的关切，为妥善解决半岛危机提供更多的思路借鉴，方能使解决问题的途径更加精准有效。

有鉴于此，本书无意也不能对东亚语言与文化提供一种全景式的观照，不以梳理出线性的历史线索为旨归，也不从东亚各国间不同语言、文化的对比方面着手，而是从编著者自身的阅读体验出发，突出一批经典著作与一些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特征的关键点，通过分析由林林总总的散点与碎片连缀而成的断面与截面，形塑出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与文化的主流发展变迁的大致趋势，以期逐步引领读者进入典籍、阅读原著，探索新知与精深的理论思考相结合，使读者最终对东亚语言与文化形成自己的见解，并能够尝试自行解答原有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困惑。

^①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46页。

中国编



第一章 中国语言

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是人类进行思维认知和开展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的出现堪称人类文明进程中质的飞跃，它对人类的思维发展与社会交际的促进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中国语言理应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语言，但习惯上专指中国的通用语言——汉语。

第一节 语言与思维认知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也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可以帮助人们固定、保存和传承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成果，反过来语言的发展变化也必然受到人们思维、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影响。20世纪的语言哲学让人们认识到，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语言塑造而达致的。

一、语言的思维认知功能

语言在人们的认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信息输入环节，语言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在信息匹配环节，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对事物的分类标准很不一样。语言在对输入的信息进行特征分析的环节也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语言系统还可以揭示没有被文字系统记录下来的文化。

墨子称“以名举实”（《墨子·小取》），荀子称“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荀子·正名》），即用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反映客观存在与客观事实。墨子又说“以辞抒意”（《墨子·小取》），“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墨子·经上》），即人们以言辞来表情达意，而之所以能够借助言辞表情达意，是因为人的思维活动在起作用。

虽然全人类思维的内容和方式存在共性，但是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具有明显差异。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甚至将语言与民族精神等同起来，认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①。

一国语言与另一国语言之间存在距离，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从某种程度上讲，思维的内容和形式决定了语言的表达方式。傅雷认为：“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人则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唯恐不尽，描写唯恐不周。”^②表现在语言的形式结构上，差异是巨大而明显的：西方语言学有一套自觉的语法体系和语言哲学的理论引导，重视性、数、格、人称和时态的变化，是典型的形态化语言；汉语语法讲究以意为主，语法具有隐含性，不注重讲求形态和形式接应，不具备屈折形态的表现手段。

二、言不尽意

言意理论常见于中国传统文论，它源自古代哲学中的“言意之辩”。老子认为“文不逮意”；《易·系辞》中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墨子·经说上》提及“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庄子·天道》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中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陆机《文赋》强调“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陶渊明诗中标举“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可见“言不尽意”的矛盾早已成为古代文论家关注的对象。

“言不尽意”不是言不达意，而是无法借助语言毫厘不爽、完整彻底地表达言者的所思所感。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关于创作构思的论述最为深刻具体：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

思维有空灵的一面，相对而言，语言则往往落到了实处。但是语言本身在发展过程

①[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页。

②傅雷：《致罗新璋》，《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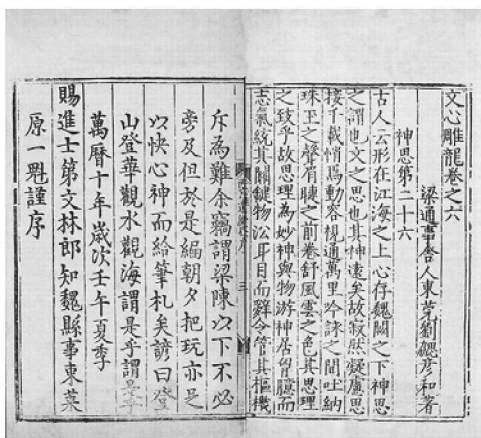


图1-1 《文心雕龙》书影

中也日渐丰富起来。语言的无限分延性使有限的言辞可以表达多重，甚至无限的意义，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自由，并为读者、批评者的理解营造出无限的阐释空间。

语言的意义具有许多层次，如乔姆斯基曾提出语言分“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人的思维运作时，头脑中产生的是意象，这时最能体验到意思；一旦开始说话写作，意象变成语言，想到的意思就开始部分“走失”，言说所能表达出来的远不如想象中的丰富、具象；而当人们把所说的话译成

另一种语言时，“走失”的意思就更多。这当中言说者、翻译者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是一重影响因素，但更重要的限制因素还是来自语言本身，此即“言不尽意”。

三、“误读”与“诗无达诂”

意义的无限可能，只能被每一个听者、读者等语言信息的接受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有限的、暂时的解读。鲁迅先生说，同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西方也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读者富有创造性，作品也为读者的创造性理解提供了空间，而究其根本，还在于语言本身的特性。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对理解过程中文本本身和读者固有的偏好导致理解的分歧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读者、批评者面对具有“文外之重旨”“文外曲致”的文本，总会在自己特定的文化知识、审美喜好的基础上阅读、理解、接受“文情难鉴”的事实，有时难免会取主观印象式的批评路径。

“误读”有语言发展本身的原因，也有读者理解上有所出入的原因。语言生成和发展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差别，决定了它不可避免会有多义性、片面性和变动性等特征。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指出：“不

^①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